

婦女研究運動

中國個案

李小江編



婦女研究運動

中國個案

李小江◎編

牛津大學出版社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New York
Athens Auckland Bangkok Bogota Bombay
Buenos Aires Calcutta Cape Town Dar es Salaam
Delhi Florence Hong Kong Istanbul Karachi
Kuala Lumpur Madras Madrid Melbourne
Mexico City Nairobi Paris Singapore
Taipei Tokyo Toronto

and associated companies in
Berlin Ibadan
Oxford is a trade mark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irst published 1997
This impression (Lowest digit)
1 3 5 7 9 8 6 4 2

婦女研究運動

中國個案
李小江編

© 牛津大學出版社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ISBN 0 19 590351 X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in writing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td. Within Hong Kong, exceptions are allowed in respect of any fair dealing for the purpose of research or private study, or criticism or review, as permitted under the Copyright Ordinance currently in force. Enquiries concerning reproduction outside these terms and in other countries should be sent to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td. at the address below

This book is sold subject to the condition that it shall not, by way of trade or otherwise, be lent, re-sold, hired out or otherwise circulated without the publisher's prior consent in any form of binding or cover other than that in which it is published and without a similar condition including this condition being imposed on the subsequent purchaser

版權所有 · 本書任何部分若未經版權持
有人允許 · 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襲或翻印

Printed in Hong Kong
Publish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td
18/F Warwick House, Taikoo Place, 979 King's Road, Quarry Bay, Hong Kong

編者前言

在中國，新時期的婦女研究在學界及婦女運動在社會生活中引人注目；不僅在國內，也在國際社會中引人關注。究其原因，與1995年在中國北京召開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有關。但它的更耐人尋味的原因，則在於它的「不同的」特點。

其特點一，不同於二十年代在中國發生的解放婦女的思想革命，這一次是由女性研究者發起並以女性學者為主體；但它仍然保留了男性學者積極參與的傳統，突顯了性別比較和文化檢討的色彩——這與西方女權主義婦女研究「批判」和「討伐」的聲勢很不相同，因此也是其特點二。

特點三，新時期中間，婦女問題出現之後，在婦女中率先作出反應的是學界，與政府的婦女組織的反應同步。當政府組織自上而下積極動員婦女參與改革時，學者的動作則起於基層，代表婦女自身的利益自發組織起來、發言（研究）和做事（運動），鮮明了「研究」先於「運動」的特點——這與西方社會中從來是婦女運動牽引出「研究」的歷史又有所不同。

結果怎麼樣呢？

結果上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和平，而不是戰爭。經過十幾年的探索和發展，在中國的婦女與社會之間，女人與男人之間，雖然多了「分離性」的批判和反省，但也更多了交流、理解、合作，無論是在研究中還是在實際運動中。合作的結果是相互間的促進而不是抗拒——這是中國當代婦女研究運動的第四個特點，也是我在與西方婦女和女權主義者對話時再三強調的一個重要問題。

這裏給出的個案是有說服力的。個案的自我分析，提供了

婦女研究運動：中國個案

大量鮮活的來自生命本身的真實信息，遠勝於多少專題研究論文或總結性的說教。文章作者絕大多數是這場運動的早期參與者或婦女研究學科帶頭人；無論性別、國別，她（他）們的經歷在不同程度上印證了以上特點。更有說服力的是人的覺醒和成長，無論女學者在婦女研究中作為女性人的自醒和自信，還是男性學者在性別解構中的自省或反省，都顯露出人性的成長和豐富——而這正是婦女研究最終的魅力所在。

附在全書後面的「關於中國婦女研究」的評論，全部出自國外的婦女學者之手。她們中多半是專事中國婦女研究的學者。這些評論從不同的文化視角出發，將中國婦女研究置於國際婦女運動和世界文化背景中，給我們的啟示也許遠在「中國」或「婦女」之外。

李小江

1996年3月26日於鄭州

作者簡介

- 梁軍 女 河南省婦女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自八〇年代中期從事婦女教育，在全國二十多個省演講逾千場次。主要著作：《女子與家政》（合著）、《女性成才的奧秘》。
- 杜芳琴 女 天津師範大學婦女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主要著作：《女性觀念的衍變》、《賀雙卿集》、《發現婦女的歷史：中國婦女史論集》。
- 林春 女 英國劍橋大學博士，現為美國波士頓大學政治系研究員。
- 李楯 男 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主義研究所研究人員。主要著作：《性與法》。
- 鄭永福 男 鄭州大學歷史系教授。主要著作：《中國婦女運動1840-1921》（合著）、《近代中國婦女生活》（合著）、《近代中國婦女運動史》（合著）。
- 康正果 男 美國耶魯大學東亞系高級講師。主要著作：《風騷與艷情：中國古典詩詞的女性研究》、《女權主義與文學》、《重審風月鑒：性與中國古典文學》。
- 李小江 女 河南大學教授、婦女學研究中心主任、婦女博物館籌備委員會主任。主要著作：《夏娃的探索：婦女研究論稿》、《女性審美意識探微》、《性溝》、《女人的出路》、《走向女人：新時期婦女研究紀實》、《告別昨天：新時期婦女運動回顧》、《挑戰與回應：新時期婦女研究講學訪談錄》。主編：「婦女研究叢書」、「知識婦女輯叢」、《華夏女性之謎》、《性別與中國》（合編）、「中國婦女與社會」、「二十世紀（中國）婦女口述史」。

婦女研究運動：中國個案

Maria Jaschok 女 德國人，英國倫敦大學博士，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研究員。

秋山洋子 女 日本東京「中國女性史研究會」研究員

Mercedes Barquet 女 墨西哥國家研究院亞非研究所研究員

Moore Goldman 女 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研究員

Nicola Spakowski 女 德國柏林自由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員

目錄

編者前言		vii
作者簡介		ix
梁軍	女性教育十年回顧 ——自我的成長：從小家走向大家	1
杜芳琴	我的婦女研究歷程 ——關於婦女研究主體的一例個案分析	37
林春	走向中國的女性主義 ——從個人經歷談起	61
李楯	我是誰/我與婦女研究	77
鄭永福	八年回顧與反思 ——我與中國近代婦女史研究	107
康正果	交織的邊緣：學術、性別和自我	127
李小江	公共空間的創造：中國婦女研究運動 ——一例個案的自我分析	141
附錄		
葉瑪麗	跨文化的探索之路 ——西方人視野中的中國婦女研究	177
秋山洋子	日本女性學與婦女研究 ——有感於李小江公共空間的創造	193
巴克特	中國婦女運動的啟示 ——略論墨西哥婦女研究	203
戈德曼	中國婦女對於解放的新觀點	213
斯巴克夫斯基	論當代中國婦女研究 ——起源、問題及理論	219

女性教育十年回顧

自我的成長：從小家走向大家

梁軍

我的故事

提筆寫下這幾個字，便感到自己的心隱隱作痛。回憶40歲以前的我，並不那麼輕鬆愉快。然而要講「自我的成長」，又必須從過去談起。

「資產階級小姐」

這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大學同學送給我的「美稱」。其實，我既不屬於資產階級，也更不是甚麼「小姐」。

我出生在一個知識分子家庭裏，父親是搞煤炭的技術人員，母親是位醫生，他們都是直接從農村士紳家庭走出來，只身在外讀書就業，沒有再回家鄉。我的家庭，就其「資產」來說，只是父母的薪水；而生活方式則更接近父母脫胎而出的鄉村士紳，與「資產階級」無緣。

父親的工資級別很高，因為多子女，家中還常年雇有保姆。可我們全家人的生活水平，很像那鄉間一毛不拔的「老地主」，儉樸得近乎寒酸。在我的記憶中，父親只有一套像樣的供「出門」穿的呢制中山裝，其餘的衣服全都打着補丁。家庭餐桌上，多見的是蔬菜和野菜，即使有肉，也只是星星點點，

聞得見肉味，卻看不見肉在哪裏。每餐飯後，身為高級工程師的父親都要把飯碗舔得乾乾淨淨，一邊舔一邊以「古訓」教我們：「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為了按父親的標準勤儉持家，母親便派給我一個經常性的任務：挖野菜。春夏時節，放學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提起竹籃奔向田野。幸虧那時城市很小，走出家門不遠便是大片的農田。

我是父母6個子女中唯一的女兒，而且在我出世前幾天，6歲的姐姐突然患急病死去（母親因此給我取名「念姊」，以紀念死去的姐姐。）我的到來給悲痛中的父母帶來了安慰，因而我不僅沒有因為自己的性別而受甚麼歧視，反而被父母稱作「寶貝閨女」，招得哥哥弟弟們妒忌。也許正因為只有這麼一個「寶貝」，父母越發地希望我能成為他們心目中具有「東方傳統美德」的「大家閨秀」、「賢良淑女」。

我能和兄弟們一樣的上學讀書，但不能像他們那樣「瘋」那樣「野」；父母要求我「喜不大笑，怒不高聲」（至少在他們面前）；和父母一起走路，不允許我的鞋底和路面摩擦發出「不雅的」嚓嚓聲；全家一起吃飯，更須小心謹慎，莫說閑談，就是咀嚼飯菜的動靜大了一點，父親的筷子就會在頓刻間毫不留情地敲在頭上。

在哥哥弟弟們完成了作業，可以去擺弄飛機模型、安裝「礦石收音機」的時候，我則要跟着母親或保姆學習「女功」：蒸饅頭、擰麵條、洗衣服、縫編鉤織等等，都是在我念初中時就掌握了的技能。（也許這是幸事？在我結婚以後，婆婆對我最滿意的就是「甚麼都會幹」。）

可我自己最樂意幹的事還是挖野菜，只有在那個時候，我可以不在父母的監控之下，和小姐妹們一起無拘無束地說笑嬉

鬧，享受片刻的自由。因此，挖野菜便成了我記憶中的少女時代唯一的「娛樂活動」，以至於幾十年後的今天，我還叫得出幾乎所有野菜的名稱，那綠瑩瑩的野菜仍然對我有一種特殊的吸引力。

我的父母不相信「女子無才便是德」，他們在學業上對我的要求像對哥哥弟弟們一樣嚴格，尤其是父親，嚴格得像是「暴君」。

我從小數學不好，可最讓我害怕的事倒不是拿着成績單回家——那時反而有一種豁出來的膽量，任父親用木條或笞帚打個痛快解恨；讓我膽顫的是他的「數學輔導」——我站在他的面前，下巴和雙腿止不住地發抖，根本聽不明白他在講些甚麼，只擔心着隨時爆發的吼叫和敲在頭頂的拳頭。這刻骨銘心的記憶使我懼怕一切「強者」——怕官、怕權威、怕惡人、怕洋人，甚至怕個性強的人，面對強者，我會表現出不加掩飾的退讓和回避。

高中畢業後，我考上了北京師範大學，這使我在父親面前稍稍挺起了腰杆，我畢竟很為他「爭氣」了。一年暑假，我仗着自己剛剛從北京回來，膽大包天地睡了一個懶覺，一起床便被叫到父親面前。那時，他患了胃癌，手術後又轉移到肝部，已不久於人世。他靠在躺椅上，雙目緊閉，面色臘黃，臉消瘦得變了形，只看見兩個高聳的顴骨。可他仍然要教訓我，一字一端：「懶惰乃是萬惡之源，你雖考上了女子師大（北京師大的前身，更名幾十年了，可父親一直叫它女子師大），也不可有須臾的惰怠……」

父親已病入膏肓，不要說再動手打我，即使張開眼睛也須費一些力氣，可我仍然是怕，低頭垂手，恭恭敬敬地聽着，大氣也不敢喘。

1995年春節，全家人的聚餐會上，又談起了去世近30年的父親。年已花甲的大哥說：「在我的記憶裏，沒有爸的笑容。」

話音一落，舉座黯然。

也許，這就是我們兄妹在文化大革命中，全部都義無反顧地「投奔革命」，而沒有一個成為「保爸保媽派」的原因？

「黨的女兒」

我嚮往革命，從很小就開始了。但在那個時候我只能「做白日夢」，夢境中總是發生着同樣一個故事：我並不是父母的親生女兒，突然有一天，我的生身父母（或是戰鬥英雄，或是革命幹部，或是被尊為領導階級的工人或農民）找上門來，我歡呼着，我被解放了！（順便說一句，我考大學時的作文，就是虛構了一個我是抗聯戰士的女兒，被一位大義滅親的東北老媽媽救下的故事。也許文中的「真情」打動了考官，給了我90分的高分，為我考上北師大起了關鍵性的作用。）

可是，夢境中的「親爹娘」始終沒有出現，社會的熱切召喚卻使我夢想成真。「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母親只生了我的身，黨的光輝照我心」，這些最流行的革命歌曲使我熱血澎湃。於是，我像當年與封建家庭決裂毅然奔赴革命聖地延安的熱血青年一樣，以極大的政治熱情加入了「革命洪流」。

大凡革命陣營的人，總以為似我這類人投身革命，一定懷着不可告人的目的：要麼趨炎附勢，要麼投機鑽營。他們這樣想，是因為他們沒有切身的體驗。其實，我這一類人革命的動機是真誠的——那是身在黑暗中向往光明的真誠；因而革命的

行動往往也是徹底的——只有「把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才能砸碎自己身上的鎖鏈。我們革命的目的，沒有那麼磊落：不是為了「解放全人類」，而是為了「解放我們自己」。

我的革命從兩個方向上開始。

革「資產階級」家庭的命，向工農兵大眾學習；

革「東方傳統女性」的命，做「男女都一樣」的社會主義新型婦女。

雙向革命同步進行，很艱難也很壯麗。

文化革命開始不久，父親便因病與世長辭（後來我們都慶幸他早早地患了絕症，否則脾氣暴躁的父親不知會選擇甚麼死法。）母親在父親火化時，用了當時最流行的做法，讓父親手執「紅寶書」（毛澤東語錄）進了火化爐。她對他說：「你活着的時候好好學習，死後也要好好學習。」於是，母親這個「資產階級技術權威的臭老婆」便成了「火燒毛主席語錄的現行反革命」。年僅54歲的母親，剛剛經受了喪夫之痛，又橫遭批鬥，左眼被打傷，幾乎失明。可是，我們這些做子女的不僅少有同情，反而雪上加霜：大弟主動帶領「紅衛兵小將」去抄了自己的家，我則從北京寫信回去，「嚴正聲明」與母親斷絕關係。直到五年以後，我才答應和她見面。

我不知道母親為這唯一的「寶貝女兒」如此絕情而經受了怎樣的打擊，因為多少年來，我們母女一直有意地回避舊事重提；我只記得自己是如何地懷着凌雲壯志，以工農兵（男性）為榜樣，脫胎換骨地改造自己——

我向工人階級學習：和環衛工人一起清理公共廁所，掏糞背糞，為身上濺滿了點點糞便而驕傲自豪，在日記上寫道：大糞不臭，資產階級思想才是臭的……

我向貧下中農學習：參加農村「四清」^①一年，學會了多種農活，白天在大田裏和農民一起挑水抗旱，擔糞施肥；夜晚則翻越山坳，到窮苦的莊戶人家「訪貧問苦」。

我向貧下中牧（牧民）學習：大學畢業，我主動要求分配到青藏高原，在「山上不長草，風颳石頭跑」。海拔3400米的藏族自治州，我和牧民一起同住四面透風的帳篷，同吃半生不熟的「手抓」「血腸」^②為了考察牧區的教育狀況，我曾被騾馬摔下，跌成「中度腦震蕩」而不罷征程；也曾迷失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山區，頭疼欲裂而不絕談笑，令同行的男子們刮目。

我向解放軍的學習是最徹底的：以自己的「終身」相許，立志嫁給一個大兵。因為文化程度的差距，他給我的「情書」上總有許多錯別字，我不在意，我愛的是他那「一顆紅星頭上戴，革命紅旗掛兩邊」的「光輝形象」。也就是因為這個大兵，我的名字由「念姊」改成了「軍」。

我向男人們看齊，不屈不撓地向自己的女性性徵挑戰：有意趁着月經來潮，跳到沒膝深的河水裏挖河泥，泡在水田裏插稻秧。甚麼活不讓婦女幹，我偏要「越是艱險越向前」。……

我滿懷豪情地做着這一切，絲毫不以為苦。

我從來沒有認真地反省，就是在這個不遺餘力的追求中，被父權家庭扭曲的我，又被「革命」在另一個方向上扭曲。

我漸漸喪失了正常人的語言和思維，甚至丟失了為人善良的本性。學校內外，大會小會，工廠農村牧區，我經常「狼鬥私字一閃念」，毫不留情地摧殘自己的人格；也批父母批師長

① 「四清」：也稱「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指1963-1966年間在中國城鄉開展的一次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的運動。

② 手抓、血腸：牧民的肉食品。

批學友批同事，「大義凜然」地摧殘他人。在我保留下來的一本「鬥私批修」日記裏，看不到人性人情，找不到真實的生活，滿篇都是讓人倒胃口的「豪言壯語」，諸如「當一輩子人民的牛，拉一輩子革命的車，一直拉到共產主義」之類。

「革命」革到這一步，又開始懷疑自己的真誠和徹底。我學習工人階級，卻不真心想去當工人；學習貧下中農，又不甘於一輩子做農民；想像男人一樣做人，卻最終還是一個女人。我忽然覺得自己非資（資產階級）非無（無產階級）、非工非農、非男也非女。

那麼，「我」是甚麼？「我」在哪裏？

在我自己的「革命後期」，我非常非常地困惑，我感到「非我」的我到處不受歡迎。每當我以「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或「徹底與資產階級家庭決裂的先進典型」登台演講的時候，就發覺聽眾的情緒中更多的是嘲笑是反感；即使那些竭力把我推為典型的黨團首領和工宣隊軍宣隊頭頭，也只是喜歡我去做他們的典型，而並不真正喜歡我這個人。

我背叛了自己的小家庭，「革命大家庭」卻並不歡迎我。

文化革命中，我是全班第一個挨批鬥、唯一戴高帽游街的學生，身上粘着一張大白紙，寫着斗大的黑字：「資產階級小姐」，「修正主義苗子」。

我的「人民子弟兵」未婚夫，也因為部隊「黨組織」的干涉提出和我解除婚約，理由是：「和你結合，就意味着對革命軍隊的背叛。」

這，就是革命給我的回報嗎？

與精神上遭受打擊的同時，在長期像男人一樣做人的「自我摧殘」中，我的健康狀況也變得很糟，患上了嚴重的痛經、胃下垂和「高原綜合症」。

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我內心痛苦，情緒消沉。經過了苦苦的思索之後，結論是：我的革命還不那麼真誠，不那麼徹底，真正徹底的革命，應當是「一輩子」。

「農民的媳婦」

我不當口頭革命派，決心一輩子和「工農兵相結合」。

嫁給軍人的理想受挫之後，經人介紹認識了我現在的丈夫。聽說他是搞音樂的，我死活不答應，搞藝術的人，大多是和「封（封建主義）、資（資本主義）、修（修正主義）」聯繫在一起的。唯一打動了我的，是他出身「貧下中農」。那時，我對男方「家庭成份」的執着，也許和現在的農村姑娘盼嫁城市，城市姑娘求嫁「老外」在性質上相同。

可是，第一次和「丈夫」會面，他就告訴我介紹人有誤，他的家庭出身是「中農」而非「下中農」。我雖然因這一字之差而懊惱，但並沒有立刻拂袖而去。一來我想，不管怎樣，「中農」畢竟屬於「勞動人民」的範疇；二來通過「丈夫」的坦誠與樸實，看到了「勞動人民的優秀品質」。他的專業雖然是作曲和指揮，但確實保留了太多的「泥土氣息」，外表看去，一點也沒有「封資修」藝術家的味道。

我答應了他的「求婚」，並立刻和他一起在凜冽的寒冬奔赴萬里之遙的「北大荒」，他的父母兄弟都生活在那裏。一路上冰天雪地，我的心卻燃燒着，不是由於對「丈夫」的愛，那時我還不熟悉他；而是對「廣闊天地，大有作為」的憧憬。

然而，我的婚姻一點也不「羅曼蒂克」，我也不知怎樣準確地表達自己婚後的感受。

我不能說我不幸福。我的丈夫具備着人性中最可寶貴的品質：真誠與善良。他始終如一地關心我、愛護我。在他那裏，

我得到了自己最缺少因而最渴望，可無論是我的家庭還是革命隊伍都沒有給我的「安全感」，正是這安全感，讓我在自己的婚姻中堅持下來。

我又不能說我是幸福的。婚後的現實生活和我內心的企盼有着太大的差距：走入勞動人民的家庭並沒有成為我「繼續革命的新起點」，反而在猝不及防的情況下，讓我從「時代新女性」的巔峯上一下子跌落到「過日子」的水平。

迎面而來的問題是經濟困窘。一面是我和丈夫微薄的工資收入，另一面卻是養老撫幼、兼顧眾親戚的重負，我不得不把所有的心思都集中在「生存問題」上，每日裏精打細算，小心翼翼地花着每一枚硬幣。「革命」似乎成為奢侈，距離我越來越遙遠。

緊接着便是觀念上的衝突。我怎樣也想不明白的是「勞動人民」的公婆怎麼比我「資產階級」父母的思想觀念還要陳舊落後，陳舊得讓人嗅不到一點點時代的氣息。即使我一心想做個農民階級的好媳婦，也絕對達不到婆婆的「高標準」。她曾對我說，只有把喂孩子的奶汁擠出來讓婆婆喝，把搖孩子的小車騰出來讓公公坐，才算得上是最賢孝的兒媳。幸虧她心疼自己的孫子，並沒有苛求我擠出乳汁讓出搖車，只是在日常的飲食起居中，想方設法讓我處在馬不停蹄、日夜操勞的狀態。只要我下了班就紮起圍裙洗衣做飯，她就不住口地誇讚：「俺梁軍就是勤快，比大媳婦強得多！」可只要一看見我拿起書本，她就吊下臉來：「看書，看書，書還能當飯吃！」那種文化層次上的隔膜，就像是千里戈壁，除了緘口，我無法找到與她溝通的話語。

丈夫又是絕對的孝子，父母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是無上的。無論我和他是怎樣的恩愛，我們家庭的利益永遠要讓位於他的